

速水融
宫本又郎

1 概述 17-18 世纪

本卷以 17—18 世纪为中心，考察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形成后的各方面的状况。

“1 概述 17—18 世纪”（引言和第 1—4 节由速水融执笔，第 5—6 节由宫本又郎执笔）根据 16 世纪日本国内旧的统治机理既已瓦解崩溃，取而代之的新机理又尚未发现，而在国际上东亚地域已变成前所未有的各种势力的活动舞台这一事实，把这个世纪看作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并试图阐明新体制寻求摆脱危机直至确立的过程；还记述了在这种新的机理下，兵农分离、城下町建设、参勤交替等制度如何刺激经济，使以往仅限于国家一部分的“经济社会化”一举在全国推广。关于江户时期的经济发展则利用获得的数量、数据勾画出大致的轮廓，以人口、耕地面积、产量、村落数、物价等为变量，揭示出变量间的关系所内含的变化趋势。

“2 德川经济的制度性框架”具体论述了概述提示的支配内容，对“制度”作了广义的解释，叙述了贡租体系的本质特征、度量衡的统一、货币制度的发展，指出它们给农民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刺激。笔者尤其试图从小额货币的发行流通中揭示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缩影。

“3 德川时代的贸易”不仅论述了给通常在“锁国”下备受轻视的贸易带来一线光明的山崎对荷兰的贸易和对中国商人的贸易，而且论述了对马、萨摩贸易的制度及数量，并指出在这些场合主要出口品银这种货币素材所产生的问题，以及进口品生丝作为丝织品原料后形成消费习惯所带来的问题。

“4 大开垦、人口、小农经济”是有争论的一章，一、应予考虑的是，战国时代以来进行的新田开发，正如过去一般所认为的，不仅在“工程学上”与领主实施的大规模河川灌溉工程相适应，而且在

“农学上”与引入适宜在冲积平原上栽培的红米品种相适应。二、对于认为从中世到近世农业经营单位的变化是从传统的“复合大家族”到“单婚小家族”的模式怀有疑问，中世存在的家族型式是近似于“宅屋共住集团”的家庭形式，关于 17 世纪人口增大的解释，以前的模式也是不妥当的。三、依据非嗣子家庭成员的分家、非农民定居化的假说，关于中世纪后期的“货币经济”向近世初期的“实物经济”发生逆转的整合性发现。笔者在这个论点被迫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史进行了根本性的再检讨，提供了应予替代的观点。

“5 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动力”论述了幕藩制下的中央都市市场及领国市场的形成，而后阐明了以地域间分工进展为契机的 17、18 世纪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变化。18 世纪的本质特征是，专门化的地方产品已经以全国市场为对象进行生产和流通，而这个时期被看作是“转型期”。

“6 德川经济的循环结构”试图用模型来说明构成经济主体与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有怎样的关系。这时不仅要把握主体间的循环，还要把握地域间的循环，并从这两方面来考察德川时代的前期与后期。接着论述了运输、尤其是海上运输机构及构成商品市场、交易的内容，还就商业化已很进步的社会中交易方法出现的新进展作了粗略的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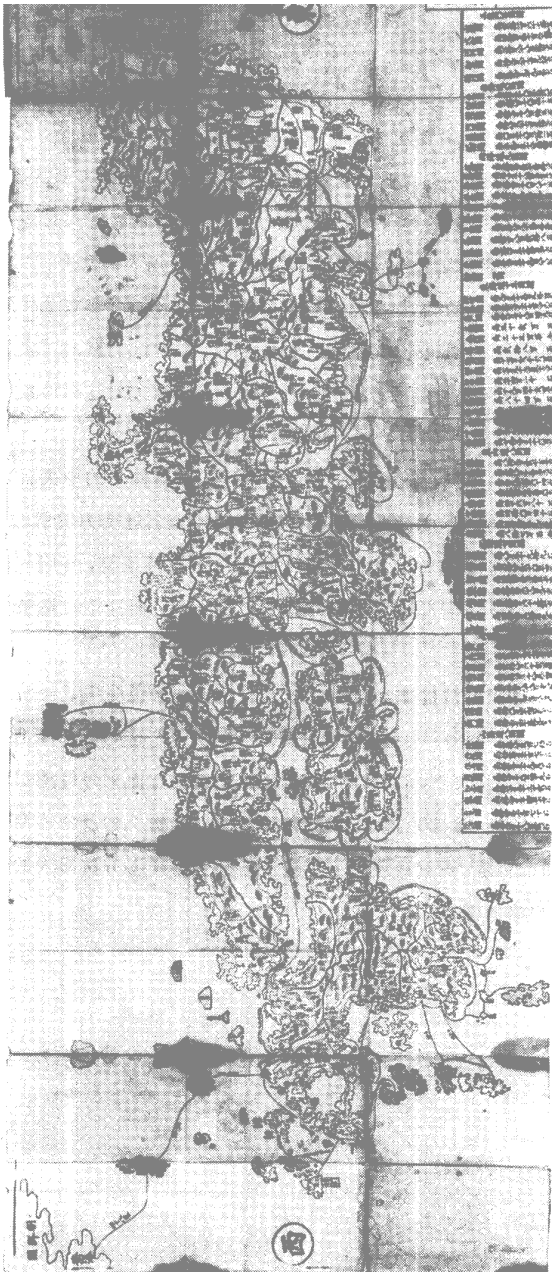


图 1-1 《新版日本国大绘图》,天和·贞享期刊(庆应义塾情报中心藏)

引 言



1580(天正8)年9月26日,织田信长以霸主身份向大和国的寺社和领主们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呈报其领地限于哪一块,名主、百姓所占部分究竟有多少的详细报告书。这类报告书按当时的说法称为“指出”。奈良兴福寺多闻院的僧侣英俊在日记中将这一事件称作“前代未闻”的事件。^①报告书必须在10日后提出,寺院方面之张皇对应由此可以想见。试问他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呢?

信长于9年前即1571(元龟2)年便作出了火攻叡山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破天荒的行动,把死抱住旧体制的人吓得胆战心惊,在室町幕府和仰靠已延续近千年的律令制和庄园制的人们看来肯定是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无法无天的人。

室町幕府于1573(元龟4)年终止,^②割据地方的大名们依靠各自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逐渐把势力向中央延伸。以前勉强维持的古代律令制和庄园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但取而代之的统治机理还没有发现,在这种状态下,日本客观上已面临“危机”的时代。

^① 辻善之助编:《多闻院日记三》,三教书院,1936年,第126—127页。

按一般的说法,该年7月19日室町幕府因将军义昭被逐出京都而灭亡。

日本周围的国际环境也动荡不已。堺商人远赴东南亚积极开展贸易，他们既颂扬往日的“全盛时期”，又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眼下“前代未闻”的活动。琉球的商船正值“大航海时代”的高潮，也在东亚海域忙碌地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活动。明朝的商人也无视政府采取的海禁政策开展走私贸易。总之，东亚海上呈现出元朝和倭寇暴乱时代之后从未有过的贸易船只熙来攘往的景象。在那些航海船只中，出现了一种当地人从未见过的异常坚固的大船。那就是装载着火炮、乘有传教士、已行驶了上万海里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单层甲板大帆船。

在历史上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彼此完全独立而活跃的社会相遇改变了各自活动的方向，规定了活动的方向，对以后的历史发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的变动时期，在变化的哪个时点上相遇这一时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与历史内部的进化不同，这种外部因素似乎也有充分考虑的必要。就是说，必须承认有时一种灾难发生后可能会使历史发生巨大变化。日本从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叶正是这种内部变动因素与外部变动因素交互作用、令人产生极大历史兴趣的时代。上述情况并没有纳入经济的框架，但我们的“经济史”的出发点确实是这种大转变的时代。

在日本史上通常采用的时代划分是根据政治事件。中世之始，为镰仓幕府的成立。近代之始被认为是明治维新政府的成立。然而从中世过渡到近世，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中世”之终止目前一般似乎认为是 1573 年室町幕府的崩溃。而关于“近世”之初始定在何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是丰臣秀吉完成天下统一的 1590（天正 18）年，虽则相差不到 20 年，但出现了一个空白带。假如把它定在江户幕府的成立，

则更要等到 1603（庆长 8）年。

然而，如果离开政治史上的事件来看看这个时代，无可否定，16 世纪最后 25 年确实是激烈动荡的时代，也确实是在这期间日本的“中世”终止，“近世”开始。在这 25 年之初、即 1575（天正 3）年，信长的步枪队在长篠运用三道战车防线的战法击溃了武田久经阵战的骑兵队。步枪的这种用法是战争史上应大书特书的事件，因为连欧洲人也还没有开创。^①最初的步枪是大约 30 年前由葡萄牙人带来的，但日本在很短时间里便能制造，并成为东亚最大的步枪制造国。步枪的威力不仅改变了战术，而且使兵农分离，使在平原上建设城下町成为可能。日本的步枪在此期间传入朝鲜半岛，充当了只能形容为极其愚蠢的丰臣秀吉的野心的工具，但同时引起国际瞩目、让丰臣秀吉采取那种行动的看来也是由于步枪的威力。

在国际关系方面，这 25 年间与欧洲势力的关系也有重大变化。对欧关系最初为葡萄牙耶稣会一家垄断，但伴随着西班牙国王兼任葡萄牙国王（1580 年）、荷兰共和国独立（1581）、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1588 年）等欧洲列强关系的变动，先是西班牙以马尼拉为据点开始介入，1600 年、即关原战役发生的同年，荷兰船抵达，日本又开始了与欧洲新势力的接触。

至于日本之外，即使到了 17 世纪仍处在这种激烈动荡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明朝覆灭，不久入主的是非汉族王朝、即清朝。在北边，俄国势力登台露面，直到 18 世纪才

杰弗里·帕克：《军事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尼奇，1988 年，第 140 页。

趋于稳定。相比之下，日本自江户幕府成立以后，虽发生过大阪之阵、岛原和天草暴乱，但国内大的动乱已经平息，能够享有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天下泰平”。在这种德川和平之下，日本把中国和西方的影响限制到最小程度，结果培育了本国特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

这样，江户时代的开始意味着各种局面在日本整合的开始，即领土大体确定，政治上发现了幕府制的统治机理，经济上开始了以全国为网络的商品流通，实行了统一的币制。外交权也正式由幕府把持，将军对外被称作“大君”，变成了实质上的元首。在世界史上可以说这也是一次宝贵的、无意识的实验。两个世纪后，日本在与经历了产业革命、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欧美列强遭遇时，假如不能保持可以与它们相对应的状况，日本近代史也许会跟我们实际经验的迥然不同。究竟什么已经准备、什么还没有准备，这就是贯穿本卷的基本课题。

本节的最后想谈一谈日本的地理条件。第一，日本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呈细长状的岛国，中央山脉横贯，气候分成太平洋一侧和日本海一侧。此外，本州的北端与九州的南端之间直线距离约有 1,500 公里，但南北间的纬度相差达 10 度，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外，比西欧任何国家都大。青森的年平均温度为摄氏 9.6 度，鹿儿岛为 17.0 度。再从月平均最低温度来看，前者 1 月份为零下 2.0 度，后者 1 月份为 6.7 度。

其次，拿降水量来说，1 年间内陆地区的长野为 1,014 毫米，距此不远的沿海地区尾鹫（三重县）为 4,158 毫米，有相当大的差异。此外，季节引起的差别也大，在太平洋沿岸，降水量集中于 6 月至 10 月之间，而 12 月至 2 月则为旱季。在日

本海沿岸，冬季降雪量多，是世界上有数的多雪地带。

这样，由于日本南北间距离长，加之太平洋沿岸与日本海沿岸的气候条件大不相同，国土拥有多彩的地球景观。就地形而论，因是细长的岛国，海岸线长，地域被山脉和山地分割，没有广大的平原，容易形成以相对小的面积为单位的“地域”。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使每个地域都生产自己的特产，刺激了地域间的分工，从而构成地域间商业发达的重要条件。陆上交通由于隘路多，内陆地区河川交通因水流湍急，说不上十分发达，但沿岸航路却有惊人发展，因此远距离的物资输送量相当可观。

这种自然条件是大自然对日本的赐予，并非仅限于江户时代。但是，在前工业化的社会，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或就其特征而言，自然条件是远比工业化以后重要得多的因素。此外，同是前工业化时期，这种自然条件，特别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在江户时代以前也不多。然而，进入江户时代，当稍后要述及的经济社会化进行时，日本现有的自然条件对于生产和流通的扩大大概可以说起了不少有利的作用。

例如，从东北地方的日本海沿岸到北陆，冬季为多雪地带，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但因有水利之便，稻米生产实行专门化却发挥了它的高生产率。本州的山丘地带不宜种稻，但由于利用了高度潮湿的气候，养蚕和制丝业显示出比较优势，以致成为幕末开港以降发展的根基。濑户内海沿岸地带，利用沙地来推广棉花栽培，提供了平民的衣料和生产工具的重要原料。此外，红花、靛蓝、菜种、砂糖、盐等等出自特定产地的商品也一一登场。食品加工业，特别是酒、酱油、豆酱等酿造业发展到以特定生产地来作为商标品牌的程度。

如果从事这些商品作物的生产，生产者可以谋取较高的收益，肥料也可以在过去自给肥料的基础上使用买来的肥料。鳀鱼粉和鲱鱼粉一类鱼肥和各种油渣等肥料既是水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酿造业发展的副产品，总之，是一些对于其它产业发展具有前瞻效应或回顾效应的东西。这样，北海道和关东产的鱼肥，可远运作为中央市场的大阪，用于濑户内的棉花栽培，生产出来的棉制品则到关东和东北销售，形成了全国商品流通网络。这种状况在江户时代以前恐怕是不能想象的。

可以看出，沿岸航路的发达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征。如宫本和上村的论文所讨论的，为人熟知的著名航路有东环航路、西环航路、驳船有菱垣驳船、樽驳船、北前船等。不过，就实际的航海而言，本州东岸，特别是从石卷到铫子之间，潮流复杂，雾也多，从秋至冬刮着强劲的西北风，加之又没有适当的避风港，以当时日本船的航海技术而言，这段航路是航道事故多发地段。因而，为将东北地方的物产运到江户，合理的解决办法势必是绕行日本海，经濑户内海抵大阪起货。这样一来，运往江户的大部分货物在地理上必须由大阪通过其商品流通体系来进行交易。结果大阪变成了“天下货栈”，江户则成了货物的终点站。

正式的分析留待稍后，这里应当先举出江户时代对近邻诸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三大主要物产，即铁、木材和纸。铁以山阴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该地采用的是传统的风箱制铁。风箱制铁业在经历了近代产业革命的制铁业的高生产率面前不得不低头认输，就是在江户时代也未能充分供给社会所要求的原料铁，但它在东北亚仍是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产业，独

占其产品的人往昔就曾实现过琉球国的统一。风箱制铁盛行不可缺少的是其燃料木炭及其原料木材。江户时代风箱制铁没有遭遇产业革命前夜英国制铁业曾经历过的深刻的燃料不足，森林资源丰富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这大概又要归于高温多湿的气候条件加快了木材的成长速度。

木材还是至关重要的建筑材料。城市化推进、木材市场形成后，各地都进行森林采伐，在木材成长速度高的纪伊半岛，与往江户市场运送便利有关系，杉、桧等人工种植林已经开始营造。^①这是高温多湿条件下想出来的应付办法。

楮是纸的原料，在全国都可以生产，但抄纸需要大量的水，山间的清流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所。纸在某种场合也被当作藩专卖的对象，但由于能以低廉价格大量地供给纸张，德川日本能够完成世界上少有的文书记录和出版许多书籍，得以保持很高的识字率。

这样，江户时代是日本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在生产 and 流通中得以充分利用的时代。鱼肥的利用，人工植林，各种酿造业的发展，都属于同时代世界上任何地方也不曾有的对自然的高度利用。日本所特有的这些产业技术的发展是江户时代的“经济社会化”所追求的结果，可以说其中许多已经汇入近代工业化的浪潮之中，教会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如何致力于有效率的生产和流通。明治以降的日本，这次迅速理解了因产业革命而飞跃增大的生产技术的意义，努力进行移植获得了成功，其原因之一大概就在于没有忽略以前历史的经验。

如纪州尾鷲林业的杉树种植林，最晚于 18 世纪 50 年代已开始。参见速水融：《对日本经济史的视角》，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 年，第 169—215 页，第 8 章《大山林地主的形成过程》。

一从“中世”到“近世”



早在政治变革之前，日本特别是其中央部分从 15 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已经在发生变迁。庄园年贡的货币化，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庄园领主居住的城市——这时限定在京都、奈良——已经变成靠货币支出购买日常必需品的入口集团的居住场所。与以前的城市相比，在功能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以前的城市居住者靠庄园的现物年贡大体上能满足对日常生活所必需物资的需要，因而它具有很强的自给性。

此外，室町时代已开展的对明代中国的贸易，使兵庫、堺、博多等城市得以建立，以贸易一类经济活动为存在基础的新城市也在形成之中。

另一方面，连远离中央的边境，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也形成小规模战国大名的城下町，“城市化”已开始进行。

不过，虽然这个时代经济变化有很大的意义，但制约条件也甚多。第一，货币、尤其是钱币的供给，国内缺乏，要依赖输入。钱币的输入贸易的利益曾是室町幕府的重要财源。为了分得其中一份，诸守护大名争夺不已。日本国内的中央政府没有货币铸造权，这一点与江户时代迥然不同。

其次，古代确立的律令制和庄园制作为虽已衰败却是唯一的制度维持机理还继续存在，室町幕府和守护大名为渗透

其政治统治不能不利用这一机理。只要这个机理继续存在，便不可能有领主对领域的支配，称作“得分”的几个等级的年贡征收权限在一块土地上便不可避免地多层重叠，从而使领域的一元化统治不可能实行，结果支持这一机理的政治权力一旦衰亡，一种无政府状态便会出现。从室町时代末期起的战国时代，由于这种情况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进入了危机时代。

说到底，这种律令制与庄园制并存本身使日本的领主制性质具有暧昧不明的特点。律令制不用说是古代中国的产物，从理念上说，一切土地和人民都归属于国家。在大化改新、即国家形成时期，日本由于没有其它可以依据，便不管有无实现的可能，把隋唐土地制度输入进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化改新以后不到一个世纪便出现了与土地公有原则完全相反的承认土地私有的法令。如何从整合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情况呢？一方面，连承认土地私有欲为合法的手续都准备就绪了，另一方面，又将庄园收为公有，那么土地公有原则与私有事实存在的接合点究竟定在何处呢？这确实是伤脑筋的事。这个矛盾连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结果，在律令政府下，庄园化是以制度容许的形式进行的。世俗的庄园领主采取的立场是，既然作为律令政府的高级官僚，起初便无需以自己的力量而可以靠律令政府的力量来征收年贡，并以两者相互依存的形式来实现。

庄园领主如想满足自己的私欲，不外乎把官府的土地变为庄园以增加收入，为了合法地进行，必须依靠权门势家的政治力量使违反国家机理的行为正当化。伴随捐赠地系庄园的增加，庄园领主权已将本所——领家这种多层结构变成了

通常形式。庄园领主阶层浸润于这种高度洗练的平安文化，其魅力在于诉诸这种行为连经济上自掘坟墓都在所不辞。结果固然产生了像《源氏物语》世界所代表的高度的贵族文化，至今我们仍引以为荣，但在社会方面则使律令政府进一步削弱，最终诞生了将政府各项权限中的军事、警察、裁判等权限把持在手的另一个政权，即幕府。

不过，镰仓、室町两幕府都没有单凭自己的力量便可以形成国家的能力。诚然，把持了军事和警察的权限便掌握了国家的大部分权力，但国家的权威并没有控制在手中。律令政府还继续存在，幕府不能无视这一存在。此外，虽然往日的荣华已经丧失，庄园领主仍住在都市里，期待着庄园的年贡，还继续在企盼着过高度的文化生活。

日本的“中世”世界与欧洲中世纪不同，古代律令制作为国家的框架依然存在，与之相矛盾的庄园制也同时并存。此外，在地方上，以实力使周边顺从后不久就具有自己本身的支配机理的在地领主开始形成。总之，这是一个极其不安定的时代。这种不安定状态之所以得以存续，原因就在于日本是岛国，与外界隔绝，除“元寇”^①时外，没有外部引起的紧张，国内历史可以缓慢地展开。如果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日本的历史，其特征为难以加上名称的过渡时期长，其本身性质既明确、也容易加上名称的时代短。而欧洲历史动态的展开是一种理想状态，没有理由认为在任何地方都必须是那种样子。

无论如何，日本的“中世”是具有不安定政权、社会结

① 指 1274--1281 年间元朝军队进攻日本。——译者注

构充满矛盾、地域差别显著等特征的社会。这时“国民经济”在任何意义上都还没有形成，此外，中央政权弱化，也不存在覆盖全国的什么经济上的指标。这种状态如果再进一步，便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发生“危机”。

因此，本卷试图揭示处理经济史的一种基本视角。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①这里说的经济性活动是指基于经济的价值观，在获得效用时力求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用的那种活动。当人们的活动按这种倾向进行调整时，“经济法”便应运而生。人是持有多元价值观的主体，经济价值不过是其中之一。例如，在考虑现今的日本时，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团都是以经济价值为中心来进行日常活动的，都确实是生活在“经济社会”之中。市场经济是财货和劳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基于这种经济价值使活动得以最大限度发挥的“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

阐明这种“经济社会”是何时和怎样成立的正是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原因何在？这种“经济社会”的经验在人类历史上并非与历史一样久远，其历史最多不过数百年，而且在空间上其成立的时期和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也可以认为它是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是按市场经济原则还是按国家指

关于“经济社会”的概念、用法，据管见所及，最初用这一概念的是罗伯特·海尔布罗尼：《经济社会的形成》，普伦蒂斯—霍尔，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0年。其日译本为，小野高治、冈岛贞一郎译：《经济社会的形成》，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但是，从专设“中世的经济社会”这一节可以看出，海尔布罗尼与笔者的思路并不完全相同。笔者本人对这一用语的详细说明可参见速水融：《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庆应通信，1973年，第14—28页，序章。

导的计划经济原则来进行近代工业化。又变成经济体制上的差异，而即使是所说的同样的市场经济，由于“经济社会”的做法，也会有各自的特点。因此，阐明这种“经济社会”成立的过程比仅仅了解过去更有意义。

当然以上所述不过是一种看法的梗概，其中有几个问题应当认识一下。要说经济性行动本身完全独立于其他的价值观而存在，就个人经验而言，显然就是在现在也颇值得怀疑。此外，我们既不能无视“国家”而行动，地域和企业一类社会集团的构成要素为了维持自己而采取非经济行动的情况也很多。经济性行动决不是现代人活动的全部内容。

但是以下情况毕竟是事实，不能不接受。那就是，一旦经济社会化推进了，生产者便要追求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大利益。既然是商品，即便是少许，消费者也要想法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去打听价格和品质方面的信息。结果生产技术开始改善，获得信息的手段也发达起来。另一方面，引入竞争必然产生胜者和败者。胜者获得经济财富，败者必然没落飘零，因而需要有社会救济手段。这种状况正是一个社会在经济社会化时必不可免的伴生现象。

经济社会化还从根基上动摇了那个社会，人人都可以寻求享受更高的物质文明、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径。在某些场合连以前繁重激烈的劳动也不成其为痛苦，而升华为勤劳伦理。这时最大的问题乃是所谓“人人”究竟指该社会中的什么人。即使社会成员多少有些差别，但在一个全体成员都采取经济性行动的社会，似乎会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即需求增大刺激着生产，使技术水准提高，成本下降，购买力上升。当然这要由经济社会化的方式及其社会构成的本质特

征来决定。

最重要的是，权力是集中于社会的某个阶层还是分散的。在集中型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果、即财富完全集中于统治阶层，经济社会化不会在社会全体中进行，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使该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更何况在已有可能获得高度的生产技术的当今世界。这样，社会将是不安定的，经济发展也找不到起点。这种情形不乏其例。

与此相反，权力分散的社会，特别是在政治与经济明显分离的社会，经济活动就是经济活动，不受政治的支配。财富不完全集中于社会的一个阶层，已成为更大的需要乃至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这种观点看，欧洲的封建社会明显是分权型社会，而古代东方社会则被看作是集中型社会的代表。

就日本来看，中世末期，以畿内为中心，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有一定的发展，市场在形成之中，商人活跃在各个市场周围，进行着富有生气的活动。土地买卖通过货币来进行，金融业者打入农村内部。最近的一些研究生动地描述了在旧支配残余存在的条件下，不受政治权力束缚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所从事的活动。^①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世末期在有限的地域内发生了“经济社会化”现象。

脇田晴子将中世的都市与作为“王侯贵族居住地”的古代都市加以区别，认为前者是“伴随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来的工商业者的集住地”（《日本中世都市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网野善彦虽然也把两者对立起来，但着眼于渔村和山村的非定居民的经济活动，他的一系列成果刺激了学术界（仅举一例，《中世民众生活的状况》，收入网野善彦：《中世再考——列岛的地域与社会》，日本编辑明星出版社，1986年，第56—98页），都说明这种状况。